



A Study on the Influence of Burton Watson's Multiple Social Identities on the Translation of *The Selected Poems of Du Fu*

LIU Shangdan LI Shan

Chengd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hina

Received: January 12, 2025

Accepted: February 10, 2025

Published: March 31, 2025

To cite this article: LIU Shangdan & LI Shan. (2025). A Study on the Influence of Burton Watson's Multiple Social Identities on the Translation of *The Selected Poems of Du Fu*.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5(1), 116–122, DOI: 10.53789/j.1653–0465.2025.0501.013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s://doi.org/10.53789/j.1653–0465.2025.0501.013>

Abstract: As the subject of translation, the translator not only assumes the role identity of the translator in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but also has multiple social identities, such as cultural identity and professional identity.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se social identities also have an impact on their translation activities. Therefo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enri Tajfel's social identity,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impact of Watson's multiple social identities on the production and publication of his *The Selected Poems of Du Fu*. It is found that as an American scholar living in Japan, Watson's cultural identity drove him to choose to translate Du Fu's poems, and to show a high degree of classicism and representativeness in his selection of materials. At the same time, as a well-known American sinologist and educator, Watson's professional identity is not only reflected in the high degree of fidelity of his translations of Du Fu's poems, including the precise reproduction of vocabulary, sentence structure, and rhythms, but also in the strong support and impetus he provided for the public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the translations. By analyzing Watson's translation practices, this paper further confirms the impact of translator identity on translation activities and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the selection of translators for the dissemination of outstanding Chinese culture.

Keywords: Translator identity; social identity; Burton Watson; *The Selected Poems of Du Fu*

Notes on the contributors: LIU Shangdan, female, is a postgraduate student of the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in Chengd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er main research direction i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intercultural. Her E-mail address is 2213730005@qq.com. LI Shan, female,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of the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in Chengd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er research focuses on translatology. Her E-mail address is 958562577@qq.com.

華茲生多重社會身份對《杜甫詩選》譯本的影響研究

劉尚丹 李 珊

成都理工大學

摘 要:譯者作為翻譯的主體,不僅在翻譯過程中承擔了譯者的角色身份,還兼具多重社會身份,如文化身份和職業身份等。本文認為,這些社會身份也會對其翻譯活動產生影響。因此,本文從亨利·泰弗爾的社會身份視角出發,考察華茲生的多重社會身份對其《杜甫詩選》產出和出版的影響。研究發現,作為一位寓居日本的美國學者,華茲生的文化身份驅動他選擇翻譯杜甫詩歌,並在選材上展現出高度的經典性與代表性。同時,作為美國知名的漢學家與教育工作者,華茲生的職業身份不僅體現在他對杜甫詩歌翻譯的高度忠實性上,包括辭彙、句式及韻律的精準再現,更在於其為譯本的出版與傳播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持與推動。本文通過分析華茲生的翻譯實踐,進一步驗證了譯者身份在翻譯活動中的影響作用,並為中國優秀文化傳播中的譯者選擇提供了參考。

關鍵詞:譯者身份;社會身份;華茲生;《杜甫詩選》

一、引言

傳統觀念中,譯者常被比作「畫家」、「旅行者」或「把關人」,被視為一種隱性的存在。自 20 世紀 70 年代起,西方翻譯研究迎來了文化轉向,譯者逐漸從幕後走向臺前,人們開始重視譯者主體性及其在翻譯活動中的地位。近年來,翻譯理論研究不斷深化,促使譯者在翻譯過程中的角色日益成為研究焦點。相較於以往僅局限於原作與譯文間靜態對比的分析方法,當前對譯者的研究更加注重探索譯者與最終譯文成果之間的動態交互關係。在翻譯實踐中,譯者是翻譯的主體,譯者的身份對於譯者在翻譯時發揮主觀能動性具有主導作用,會對其翻譯活動造成一定的影響,進而使得譯本呈現出多樣化的風格和特點,並影響著譯作的出版與接受。

選擇一位恰當的譯者,對於推動中華文化典籍的對外傳播至關重要。「一位瞭解中國文化、中國哲學、中國文學的譯者,方能夠將中華文化典籍中的精髓根植於譯本中。」^①在西方世界接觸漢詩的歷史中,杜甫是中國詩人中較早被西方讀者所瞭解的,他的作品被翻譯並引入西方已超過三個世紀,對文學和文化產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其中,華茲生的譯作《杜甫詩選》在杜甫詩歌英譯領域佔據舉足輕重的地位,共收錄了 135 首杜甫的詩歌譯文。「他的譯詩頻頻入選權威文學選集,譯本不僅被列入『東方經典著作譯叢』,作為教材而使用,還得到了中國學界的肯定,被收入《中華大文庫》以英漢對照版的形式發行。」^②

近些年,杜甫詩歌的英譯研究已取得顯著成果,但仍有待深入挖掘。前人研究多聚焦於杜甫詩歌的翻譯內部研究以及翻譯外部研究,翻譯內外結合研究相對比較缺乏,且多數都從社會翻譯學視角開展研究,缺乏跨學科的新視角研究範式。林嘉新曾在文章中指出,華茲生的《杜甫詩選》在學術界廣受好評,不僅體現了翻譯文學的詩性,還兼具文獻功能,對杜詩在美國的譯介做出了重要貢獻^③。然而,現有研究多集中於華茲生其他作品的英譯分析,對其《杜甫詩選》的深入研究相對較少,且多從語言層面展開,較少探討譯者社會身份對翻譯過程及成果的影響。因此,本文旨在從亨利·泰弗爾的社會身份視角出發,通過探討華茲生的



多重社會身份如何影響其《杜甫詩選》的產出及出版,以期揭示譯者身份在跨文化翻譯中的重要作用,為杜甫詩歌英譯研究提供新的視角。

二、華茲生獨特的譯者身份

李文靜曾在其文章中指出,亨利·泰弗爾的社會身份理論是群體關係研究中最具影響力的理論之一,它旨在解釋群體間的行為。這裏的「身份」是基於社會群體的成員資格而建立起來,因此稱為「社會身份」,或曰「群體身份」^④。譯者,身為社會構成的一員,其身份認同呈現出多元化的交互特性。通常情況下,譯者在從事翻譯工作時所獲得的角色身份,僅僅是其在該特定活動中的一種體現,這並不能全面地反映其在社會中通過與其他群體互動所建構的文化身份或職業身份。因此,翻譯實踐實際上成為了譯者傳遞其所屬社會群體的思想觀念、社會心態以及文化意識的一種媒介。這些深入內心的群體認同感,塑造了譯者在社會交往中針對自我群體及他者群體的行為規範與認知框架,進而對其翻譯過程中的選擇產生引導作用,包括是否採用靠近原文或譯文的策略。由此可見,譯者的社會身份會影響其經驗視角、對原作的理解與詮釋方式,因而在翻譯活動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

「譯者本身就是被社會建構的,成長於社會,在社會化進程中建構世界觀、倫理觀和審美價值觀」^⑤。譯者的社會身份建構與其個人經歷和教育背景密切相關,華茲生社會身份的獨特性體現在兩個方面:第一,華茲生是旅居於日本的美國學者。華茲生在日本度過了超過六十年的旅居生涯,在寓居日本和返回美國的過程中,他兼具局內人和局外人的雙重角色,遊走於母國文化、移居國文化和中國文化之間。因此,華茲生豐富的散居體驗構成了他獨特的文化身份,並將其融入了自己的翻譯活動之中。第二,華茲生是美國著名的漢學家,曾在哥倫比亞大學、斯坦福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任教並從事研究。作為漢學家、教育工作者的職業身份,使得華茲生積攢了深厚的漢語功底、中國文化底蘊以及豐厚的社會資源,進而影響其翻譯活動。由此觀之,華茲生的文化身份和職業身份無疑會在其翻譯工作中產生顯著的影響。

三、文化身份與《杜甫詩選》的翻譯動機和選材

1951年8月,華茲生踏上了前往日本的旅程,標誌著他在東瀛長達幾十年的旅居生活的開始,直至2017年逝世。在此期間,除了數次短暫赴哥倫比亞大學、斯坦福大學及香港中文大學進行學術研究與教學任務,以及兩次匆忙的中國之行外,他幾乎未曾遠離日本這片土地。在此期間,華茲生在日本和美國之間遊走,兼具局內人和局外人的雙重角色,徘徊於母國文化、移居國文化及中國文化之間,其豐富的散居體驗構成了他獨特的文化身份。作為一個癡迷於中國文化、寓居日本的美國學者,華茲生在日本的中國典籍翻譯工作深受美國歷史背景的影響。

(一) 文化身份對翻譯動機的影響

華茲生,作為一名擁有深厚美國文化背景的學者,其獨特的文化身份在他選擇翻譯杜甫詩歌的歷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這一選擇不僅回應了二戰後美國為提升對中國認知而推動的文化研究與翻譯倡議,更是其個人學術追求與早年學術經歷相結合的產物。在二戰後全球格局的深刻變化下,中國的國際地位顯著提升,促使美國政府及社會各界加大了對中國文化的關注與研究投入。華茲生,作為土生土長的美國人,敏銳地感知到了這一時代潮流,並主動融入到了這一國家層面的文化探索之中。他的參與,既是對國家需求的回應,也是個人學術興趣與國家戰略需求相契合的體現。然而,華茲生決定翻譯杜甫詩歌的背後,有著他早



年學術生涯的深刻烙印。具體來說,他在 1951 年至 1955 年期間,有幸成為日本傑出漢學家吉川幸次郎的學生及研究助手,這一時期,吉川正專注於漢語古詩,尤其是杜甫詩歌對仗藝術的探索。在吉川的悉心指導下,華茲生不僅深入接觸了杜甫的詩作,還將其研究成果轉化為英文。華茲生的這一翻譯活動,無疑契合了美國的國家戰略需求,並促進了中國古典詩詞在西方世界的傳播。

(二) 文化身份對翻譯選材的影響

多年來,美國譯者致力於漢語古詩的翻譯,特別是編年體譯詩選的出版,讓美國讀者逐步認識到了漢語古詩的原貌。通過這些譯作,美國讀者對漢語古詩的理解變得更加全面、客觀和準確,超越了以往零散的譯詩閱讀。通過代表性與經典性的篇目來瞭解詩人及其名下詩歌的全貌實為美國讀者所久盼。

作為一個致力於漢學研究的美國學者,華茲生的文化身份促使他在選擇翻譯杜甫詩歌篇目時,盡力契合美國讀者的閱讀期待,選材極具代表性與經典性。杜甫的詩歌因其「詩史」之稱而聞名,他的詩歌常常涉及政權更迭的動盪、民眾生活的困苦以及政界陰暗面等主題,深刻展現了其秉持的儒家仁愛理念與深切的憂國憂民情懷,這一類詩歌主題在杜甫詩歌中極具代表性與經典性。因此,華茲生在選擇翻譯杜甫詩歌時,「選譯篇目多數為關注民生疾苦、社會動盪、政治黑暗和其人生起落、仕宦沉浮的詩歌,與選譯陸遊詩歌時所表現出的審美偏好大相徑庭,凸顯了譯者對代表性的關注。」^⑥《杜甫詩選》精心收錄了總計 135 首詩歌,這些詩作大多屬於杜甫流傳下來的經典之作,諸如《兵車行》《無家別》《贈衛八處士》等名篇均被囊括其中。與此同時,為了全面展示杜甫詩歌的風貌,華茲生在編譯過程中,還特意挑選並翻譯了一些雖名氣不甚顯赫卻同樣值得細細品味的篇目,如《卜居》《江村》《春夜喜雨》《絕句二首》等。這類詩歌是杜甫寓居於巴蜀地區所作,主要以百姓的農事、日常生活、山川景物和風土人情為創作題材,體現了一種輕鬆閒適之感。20 世紀中葉以後,美國詩歌十分注重描寫普通人的生活感受,華茲生的此類選材也正契合了當時美國詩歌的審美偏好,很有可能吸引現代讀者。由此可見,作為一個美國學者,華茲生的文化身份不僅使其翻譯選材極具代表性與經典性,還全面展示了杜甫詩歌的風貌,讓目標讀者能夠充分認識到杜甫詩歌的原有面貌。

四、職業身份與《杜甫詩選》的譯本表達和出版

華茲生是美國著名的漢學家,自幼便對中國文化有著濃厚的學習興趣。自 1946 年起,華茲生先後求學於哥倫比亞大學與京都大學,期間他系統地學習了漢語並深入鑽研了中國文學。隨後,他輾轉於全球多個頂尖學府,包括哥倫比亞大學、京都大學、斯坦福大學及香港中文大學,致力於漢語教學與漢學領域的研究工作。作為漢學家和教育工作者,華茲生的職業身份使他積累了深厚的漢語功底、中國文化底蘊和豐富的社會資源,這些都對他《杜甫詩選》的翻譯活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重點體現在其譯本的表達與出版方面。

(一) 職業身份對譯本表達的影響

作為一名漢學家,華茲生憑藉其多年求學所積累的深厚中國文化素養與精湛的漢語能力,在翻譯杜甫詩歌的過程中,展現出了對原詩語言的敏銳捕捉與深刻闡釋能力。

首先,在辭彙層面,由於華茲生出色的漢語語言能力,使他能夠出色地理解原詩的內容與語義,使其譯詩充分貼合原詩。

例 1

原文: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回。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119 LIU shangdan



LI shan)

華譯本: Wind shrill in the tall sky, gibbons wailing dolefully; beaches clean, sands white, overhead the circling birds: leaves fall, no end to them, rustling, rustling down; ceaselessly the long river rushes, rushes on. (Watson, 2009: 315)

這兩行詩句專注於描繪秋日景致,通過登高所見的敘述,緊緊把握住了秋季特有的風貌,細膩地勾勒出一幅江邊空曠而寂寥的畫面。首先,詩中的意象詞「風」、「猿」、「鳥」、「落木」、「長江」等等都採用了直譯的翻譯方法,力求忠實於原文的含義。其次,擬聲詞「蕭蕭」、「滾滾」,由於在英語中沒有對應的辭彙,因此華茲生在翻譯時,便採取了意譯的翻譯方法,將其翻譯為了「rustling, rustling」、「rushes, rushes」,選取了英語中能傳達類似聲音的辭彙,來表達原詩落木窸窣之聲,長江洶湧之狀。

其次,在句式方面,由於華茲生在京都大學深造期間,師從日本傑出漢學家吉川幸次郎,鑽研杜甫詩歌的對仗藝術。這段學術歷程不僅深刻影響了華茲生對杜甫詩歌的理解,更促使他在翻譯實踐中,竭力保留並展現原詩中精妙絕倫的對仗結構與創作技法,從而確保了譯作能夠忠實傳達杜甫詩歌的獨特魅力與韻味。

例 2

原文: 細草微風岸,危檣獨夜舟。星垂平野闊,月湧大江流。名豈文章著,官應老病休。飄飄何所似,天地一沙鷗。

華譯本: Delicate grasses, faint wind on the bank; stark mast, a lone night boat; stars hang down, over broad fields sweeping; the moon boils up, on the great river flowing. Fame—how can my writings win me that? Office—age and sickness have brought it to an end. Fluttering, fluttering, where is my likeness? Sky and earth and one sandy gull. (Watson, 2009: 261)

這首五言律詩極具典型性,其首聯與頷聯形成了經典的對仗格式。在翻譯過程中,華茲生巧妙地運用了平行結構來複現這種對仗美感,特別是在辭彙層面,他採用了嚴格的一一映射式平行結構,比如首聯和頷聯中的 delicate grasses $\longleftrightarrow$ stark mast, hang down $\longleftrightarrow$ boils up, over broad fields $\longleftrightarrow$ on the great river, sweeping $\longleftrightarrow$ flowing 等均使用不同的平行結構以對應。其次,在頸聯中,華茲生在句子結構上使用了並列結構,前後對稱,兩個句子均以一個名詞引出了對名望和官職的討論,構成了平行的引導詞。華茲生的譯詩在效果上貼近原作,他巧妙地將原詩的節奏感、疊字運用及對仗等形式特點融入到了英文自由體詩歌之中,展現了他在翻譯杜甫詩歌時對詩性原則的堅持。

最後,在韻律方面,華茲生在翻譯過程中,針對原詩的疊詞等音韻技巧進行了細緻的仿擬,從而鮮明地再現了原詩獨特的音韻特徵和藝術效果。例如,在《兵車行》一詩中,華茲生將原詩「車轢轢,馬蕭蕭。」翻譯為了「Rumble-rumble of wagons, horses whinnying。」^⑦首先,在原文中,「轢轢」與「蕭蕭」作為擬聲詞,分別生動地描繪了車輪滾動的轟隆聲與馬匹嘶鳴的悠長聲。而在譯文中,通過使用「rumble-rumble」與「whinnying」這兩個辭彙,同樣成功地模擬出了車輪轟鳴及馬匹鳴叫的聲音效果,保留了原文的擬聲特點;其次,譯文中的「rumble-rumble」通過重複同一個詞,模仿了原文「轢轢」的重複音韻效果。而「whinnying」則選用了一個帶有連續音節的詞,仿效了「蕭蕭」的音韻特點,使得整個句子在讀起來時依舊具有韻律感。

(二) 職業身份對譯本出版的影響

從青年學者到知名教授,華茲生除在日本學習期間,華茲生大部分時間所在的哥倫比亞大學是全美國



的亞洲研究和漢學重鎮。作為青年學者和後來的知名教授，華茲生在哥倫比亞大學求學與任教期間，積累了豐富的社會資源，這些資源對他譯作《杜甫詩選》的出版與發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首先，自 20 世紀 60 年代以來，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推出了多種亞洲研究叢書，包括《亞洲經典譯文叢書》(*Translation from the Asian Classics*)和《亞洲文化研究叢書》(*Studies in Asian Cultures*)等。哥倫比亞大學的亞洲研究專案及其大學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華茲生的漢詩英譯工作與漢學研究的順利開展，並最終使其成果得以面世。《杜甫詩選》便是於 2003 年由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支持出版的，而華茲生能夠得到這樣的支持，與其在哥倫比亞大學的求學與任教經歷密不可分。

其次，為了滿足戰後國際戰略佈局與地區形勢的需要，美國政府特別設立了基金，用於吸引亞洲研究領域的專家學者，以便深入探究東亞各國的國家情況。包括華茲生的母校哥倫比亞大學在內，許多高等學府都積極參與其中，但面臨相關教材短缺的問題。為了應對漢學教材及相關書籍資源稀缺的挑戰，1950 年，一項名為「東方經典譯叢」(*Translations of Oriental Classics*)的重大翻譯專案在狄百瑞的引領下啟動，多家機構，包括美國教育基金會、福特基金會以及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等，為該專案提供了資助與支持。華茲生憑藉其在哥倫比亞大學與狄百瑞的學術淵源，成功獲得該專案資助，使《杜甫詩選》不僅成為學術研究的重要成果，更被廣泛應用於教育領域，進一步擴大了其影響力。

由此可見，華茲生在哥倫比亞大學的職業身份，為其譯作《杜甫詩選》的出版提供了關鍵的支持和資源，促進了其譯作的廣泛傳播和影響力的提升。

五、結語

本文以華茲生的《杜甫詩選》翻譯活動為個案，從亨利·泰弗爾的社會身份視角出發，分析譯者的社會身份對翻譯實踐的影響作用。研究發現，作為一名癡迷於中國文化、居住在日本的美國學者，華茲生的文化身份影響了他翻譯《杜甫詩選》的動機與選材。在美國國家戰略和讀者期待的驅動下，華茲生選擇翻譯杜甫的詩歌，並且選材頗具經典性和代表性；作為一名漢學家與教育工作者，華茲生的職業身份則影響了《杜甫詩選》的譯本表達與出版。首先，華茲生在翻譯杜甫詩歌時，在辭彙、句式和韻律方面高度忠實於原詩，展示了他深厚的漢學素養。其次，華茲生從青年學者到知名教授的職業身份，為《杜甫詩選》的出版提供了關鍵的支持和資源。他在哥倫比亞大學的學術生涯，不僅幫助他積累了豐富的社會資源，還直接影響了譯作的出版和廣泛傳播。

注釋

- ① 許多：《譯者身份對翻譯過程的影響——以羅慕士譯本中的曹操形象為例》，《外語教學》，2018 年第 6 期，頁 85-89。
- ②③⑥ 林嘉新：《詩性原則與文獻意識：美國漢學家華茲生英譯杜甫詩歌研究》，《中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 年第 4 期，頁 180-190。
- ④ 李文靜：《譯者是誰？譯者的身份認同與翻譯研究》，中國香港：香港嶺南大學，2011 年版。
- ⑤ 傅敬民，張開植：《翻譯的社會性與社會的翻譯性》，《解放軍外國語學院學報》，2022 年第 1 期，頁 120-127+161。
- ⑦ 華茲生：《杜甫詩選：漢英對照》，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

參考文獻

- ① Burton, W. (1893). *The Selected Poems of Du Fu*.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② Hogg M A, Ridgeway C L. (2003). Social identity: Sociological and social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s.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 97–100.

- ③ Tajfel H, Billig M G, Bundy R P, et al. (1971). Social categorization and intergroup behaviour.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2), 149–178.
- ④ TAN Qianqian. (2024). A Study on English Translation of Vernacular Langua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lator Behavior Studies in *A Small Town Called Hibiscus*.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4(4), 125–130.
- ⑤ JI Ruoqian, HU Honghui & LIU Longlong. (2023). Exploring Universality and Specificity in Poetry Translation: A Review of *Translating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 into World Literature: Burton Watson's Translation as a Case*.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3(3), 090–095.
- ⑥ 馮志:《杜甫傳》,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4年版。
- ⑦ 傅敬民,張開植:《翻譯的社會性與社會的翻譯性》,《解放軍外國語學院學報》,2022年第1期,頁20–127+161。
- ⑧ 李文靜:《譯者是誰?譯者的身份認同與翻譯研究》,中國香港:香港嶺南大學,2011年版。
- ⑨ 林嘉新:《詩性原則與文獻意識:美國漢學家華茲生英譯杜甫詩歌研究》,《中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4期,頁180–190。
- ⑩ 譚素琴:《社會認同理論下的譯者身份與翻譯選擇——以查良錚為例》,《天津外國語大學學報》,2017年2第1期,頁32–37+81。
- ⑪ 許多:《譯者身份對翻譯過程的影響——以羅慕士譯本中的曹操形象為例》,《外語教學》,2018年第6期,頁85–89。
- ⑫ 楊國強,呂世生:《獨在異鄉為「譯」客——美國漢學家華茲生寓居日本的翻譯歷程考察與反思》,《東北亞外語研究》,2022年第2期,頁51–64。
- ⑬ 趙秋榮,孫培真:《譯者多重身份對譯者行為影響路徑的語料庫考察——以〈傳習錄〉英譯本為例》,《外國語文(雙月刊)》,2024年第1期,頁131–143。

(Editors: LI Ruobing & Bonnie WANG)